

现代中学国文教育简史

(1904-1949 年)

赵新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中学国文教育简史

(1904-1949 年)

赵新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中学国文教育简史: 1904—1949 年 / 赵新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 - 7 - 5203 - 2164 - 8

I. ①现… II. ①赵… III. ①中学语文课—教育史—中国—
1904—1949 IV. ①G63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311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安 芳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75
插 页 2
字 数 234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疆师范大学校级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项目经费资助
新疆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现代中学语文教育史研究”
(编号 XJNUBS1601) 阶段性成果

目 录

第一章 道德为先 应用为范(1904—1911 年)	(1)
第一节 清末时期中学国文教育的政策性规定	(2)
一 中国现代“中学”的产生与发展	(2)
二 现代“国文”学科的独立	(4)
三 《奏定学堂章程》中有关中学国文教育的规定与要求	(5)
第二节 清末时期的现代中学国文教科书	(7)
一 中国现代教科书的萌芽与发展	(7)
二 清末时期现代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辑出版概况	(9)
三 清末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呈现的现代国文教育理念	(16)
四 清末时期的代表性现代中学国文教科书概貌	(20)
第三节 清末时期的现代中学国文考试	(29)
一 新式学堂招生对国文的要求	(31)
二 出国留学考试中的国文程度要求	(32)
小 结	(32)
第二章 审美渐显 关注情感(1912—1919 年)	(34)
第一节 民国初期现代中学国文教育的政策性规定	(35)
一 民国初期现代中学规范化发展的制度保证	(35)
二 民国初期课程文件对中学国文教育的规定与要求	(36)
第二节 民初时期的现代中学国文教科书	(39)
一 重订清末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	(39)
二 民初时期新编现代中学国文教科书	(40)
三 现代中学国文知识教科书	(47)

四 民初时期现代中学国文教科书编排的进步	(49)
五 民初代表性现代中学国文教科书概貌	(51)
第三节 民国初期的现代中学国文考试	(57)
一 民初大学预科招生考试中的国文试题	(57)
二 民初研究生入学考试、留学生考试中的国文试题	(62)
三 公务员考试中的国文试题	(63)
小 结	(65)
第三章 古今并选 大众经典(1920—1927年)	(66)
第一节 民国新学制时期现代中学国文教育的政策性规定	(67)
一 中国“三三”制现代中学教育体制的确立	(67)
二 新学制时期对现代中学国文教育的政策性规定与要求	(68)
第二节 新学制时期的现代中学国文教科书	(76)
一 自修用补充教材	(76)
二 新编现代中学国文教科书	(78)
三 新学制时期代表性现代中学国文教科书概貌	(83)
四 教科书中的女性形象:社会底层人,自立女国民	(86)
第三节 新学制时期的现代中学国文考试	(88)
一 大学入学考试中的国文试题	(89)
二 现代中学入学考试试题	(93)
小 结	(96)
第四章 注重实用 欣赏文艺(1928—1932年)	(98)
第一节 1929年课程标准时期国文教育的政策性规定	(99)
一 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颁布与实施	(99)
二 1929年课程标准对现代中学国文教育的规定与要求	(100)
第二节 1929年课程标准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	(109)
一 新的出版机构陆续介入,教科书种类众多	(109)
二 现代中学国文教科书编排的科学化、规范化	(111)
第三节 1929年课程标准时期的中学国文考试	(114)
一 初级中学入学试题淡化文言、降低难度	(114)

二 高级中学入学考试“国文”常识,不可忽视古代作品	(118)
小 结	(120)
第五章 文化宣传 主题首选(1933—1937 年)	(122)
第一节 1932 年课程标准时期国文教育的政策性规定	(123)
一 1932 年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新变化	(123)
二 1932 年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摘录	(128)
第二节 1932 年课程标准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	(135)
一 普通中学教科书	(135)
二 国文特种读本	(139)
第三节 1932 年课程标准时期的中学国文考试	(143)
一 初中入学考试禁止文言,难度再次降低	(144)
二 初中毕业会考试题,不可忽视古代文学、文法知识	(145)
三 高中入学考试国文试题青睐文言,注重国学常识	(147)
小 结	(152)
第六章 战火弥漫 国文不断(1938—1945 年)	(154)
第一节 全面抗战时期国文教育的政策性规定	(155)
一 沦陷区教育政策	(155)
二 国统区教育政策	(157)
三 根据地教育政策	(158)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现代中学国文教科书	(159)
一 沦陷区的中学国文教科书	(160)
二 国统区中学国文教科书	(166)
三 根据地中学国文教科书	(169)
四 全面抗战时期各版本中学国文教科书选文文、白比例	(172)
小 结	(173)
第七章 语言教育、思想教育并行(1946—1949 年)	(174)
第一节 解放区教育政策与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出版	(174)
第二节 解放区现代中学国文教育的特点	(180)

一 《中等国文》选文概况	(180)
二 《中等国文》呈现的解放区中学国文教育特点	(188)
小 结	(192)
附 录	(194)

第一章

道德为先 应用为范（1904—1911年）

入中学堂者作文自不可缓。文者积字而成，用字必有来历（经史子集及近人文集皆可）。文法备于古人之文，故求文法者必自讲读始，先使读经史子集中平易雅驯之文。作文以清真雅正为主。

讲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处。

——《奏定学堂章程》

初编近世文为主，二三编中古及上古文居多。书既成，援保存国粹之义，颜之曰中学文粹。

——许贵、苏氏：《中学文粹·弁言》

今科举已废，学堂肇兴，文章一道，视昔宜加重矣，且将欲究古今之宜，致当世之用。自昔纂录，以桐城姚氏古文辞类纂及湘乡曾氏经史百家杂抄最为有义法，百年以来，承学治古文者，率奉为指归。此编谨奉《钦定学堂章程》中学五年，分为五编。其纂录之浅深视年期为进退，范围不越乎姚氏曾氏而程度则求合乎学者之用也。

——潘博：《高等国文读本·叙》

此编所选，专以助人之精神兴趣，而仍不戾于绳尺者为主。

期于每集之中，诸体略备。

词赋骈文，兹编一概不录。惟赞、颂、箴、铭、哀、祭诸体，

多用有韵之文，今于每集俱存数篇。

古文用法之妙，纵横变化，不可方物。故昔人以行云流水为比。

——吴曾祺：《中学堂用国文教科书·例言》

本书选辑古今名家之文，生存人不选。

本书所选之文，各类略备，使读者稍知其门径。

——林纾：《中学国文读本·凡例》

第一节 清末时期中学国文教育的政策性规定

一 中国现代“中学”的产生与发展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早就有了“大学”“小学”的概念，《礼记·王制》：“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大戴礼记·保傅篇》：“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小学，小学者，所学之宫也……古者八岁而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但中国古代的“大学”“小学”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小学”是不同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中学”“小学”是三段制学校系统中的概念，是“西学东渐”的产物。

中国古代的学校体系中，一直没有“中学”的说法。“中学”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国中央政府的法令文件之中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该年五月，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的《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中道：

本年正月初七日上谕，已有各省学堂经济科举人、经济科贡士各名号。今拟通飭各省上自省会下及府州县，皆须一年内设立学堂，府州县谓之小学，省会谓之中学，京师谓之大学，由小学卒業领有文凭者作为经济生员升入中学，由中学卒業领有文凭者作为举人升入大学，由大学卒業领有文凭者作为进士引见授官。^①

①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由于戊戌变法最终没有成功，此中提出的教育规划没能真正实行，但三段学制和“中学”的观念开始深入国人心中。

“三段制”学校在中国最早的实践，一般被认为是19世纪末成立于上海的南洋公学，该校于1897年正式开办，先后设立四院，其中的师范院（1897）相当于师范学堂；外院（1897）、中院（1898）、上院（1900）大略分别相当于小学、中学、大学，三级相互衔接，依次递升，初具三段制现代学校体系的雏形。^①于1898年春设立，修业年限为四年的南洋公学中院，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名实相符的中学。^②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布并由政府督导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中学堂章程·立学总义》规定：“设普通中学堂，令高等小学毕业者入焉，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③规定中学堂的学习年限为五年，并要求“各府必设一所，如能州县皆设一所最善”。《中学堂章程》还对中学堂的学生额数、经费来源、学习科目设置、入学办法、教室图书器具配备标准、教员管理员制度等都有明确的条文说明，这就从制度上为现代“中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清政府同时还颁布了《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高等小学堂毕业应升学之学生，经府道会同监督，考送入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实业学堂者，俟学政按临该府时，覆加考试，合格者升入以上三者学堂肄业。最优等作为廪生，优等作为增生，中等作为附生，分别收入所升学堂肄业。下等发回原学，作为倍生。准用顶戴，均由学政填给执照，咨明学务大臣，礼部备案。最下等遣回原籍。”^④中学堂学生完成修业年限，在学习期满时要参加考试，成绩为最优等、优等、中等的被保送升

① 王伦信：《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② 《南洋公学大事记》，朱有瓚：《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7页。

③ 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278页。

④ 同上书，第404页。

入上一级学堂,同时还被授予功名:最优等作为拔贡,优等作为优贡,中等作为岁贡,“均有督抚学政填给会衔执照”;即使考试成绩为下等者发回原籍,也作为优廪生,并报礼部备案。^①我们可以参照“程度与中学堂同而略胜”的初级师范学堂毕业学生的待遇来观照一下中学堂毕业生的待遇,“考列最优等者作为拔贡,以教授尽先选用,并加六品衔,令充高等小学堂教员”^②。在清代,官级为“九品十八级”,“六品”衔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待遇了。

总之,清末学制是培养官员的“单轨制”,规定了从初小开始逐步升入大学堂,然后分配官职,^③这就决定了清末中学堂学生是未来的官员,中学教育应该适应“预备官员”的培养,这与我们今天的中小学基础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

二 现代“国文”学科独立

中国的汉语文教育,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古代没有形成系统的语文教育体系,没有专门的“语文”学科,给我们留下的只是“前学科”时期的语文教育遗产。^④《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分科设学,并设置了“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学)”这两门与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密切联系的课程,但没有设置“国文”科。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该书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已出来,未及五六日而已销完四千部”^⑤，“国文”一词也随该教科书的畅销而大行其道。这一期间,其他书局也编印了“国文”教科书,如文明书局的《高小国文读本》、江楚编译官书局的《高等国文教科书》、中国图书公司的《初小国文课本》《高小国文课本》等。^⑥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学部附设的图书局编写了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

① 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403页。

② 同上书,第405页。

③ 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变迁》,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9页。

④ 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⑤ 汪家熔选注:《蒋维乔日记选》,《出版史料》1992年第2期。

⑥ 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册,标志着官方也开始使用“国文”名称;同年颁布的官方文件性质的《学部颁订京师初等小学划一课程表》中也出现了“国文”,并规定“国文”每周9学时;宣统元年(1909)颁布的《学部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国文”被正式列入章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版界和学界以正确的教育原理推动实际,清政府不得不按照“国文”课本造成的事实修正了以前的规定,承认了“国文”的合理性及合法地位,使学制变得切合社会进步。^①

“国文”概念的成立,是与近代国家观念的萌发,继而要求通行全国、代表国民精神的文字分不开的。^② 吕思勉在1909年就撰文指出:“一国之民所以能结合为一国家者,结合之力尤以语言文字为最大。盖语言文字相同,则国民之感情因之而亲洽,一国之文化缘此而获调和。虽种族、宗族、风俗,或有不同,而其结果,自能混合于无形也。”^③ 面对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冲击,近代学人又往往把“国文”和保种、保国联系起来,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如张謇就说过:“夫凡成一国必自有文,苟尽不文,其胡能国?”他鉴于“科举停废,士竞科学,以文字为无用,致废书而不观”的顾虑,于1909年在通州中学附设了国文专修科,“为社会政府储有用之才,即为社会政府通将来之译”。^④ 早期的国文教科书多标以“国学”“国粹”之名,新学会社出版的《国学讲义》、文明书局出版的《国粹教科书》、有正书局出版的《国文粹化读本》,等等。

三 《奏定学堂章程》中有关中学国文教育的规定与要求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要求重视“各体文辞”:

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古文所以阐理、纪事、树德、达情最为可贵;骈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

① 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变迁》,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3—75页。

② 陆胤:《清末“蒙学读本”的文体意识与“国文”学科之建构》,《文学遗产》2013年第3期。

③ 博山:《全国初等小学均宜改用通俗文以统一国语议》,《东方杂志》1911年第八卷第三号。

④ 张謇:《通州中学附设国文专修科述义》,《教育杂志》1909年第一卷第八期。

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藉此亦可稍存古人乐教遗意。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文学既废,则经籍无人能读矣,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此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假使学堂中人全不能操笔为文,则将来入官以后,所有奏议、公牍、书札、记事,将令何人为之乎?行文既不能通畅,焉能畀以要职重任乎?近代文人往往传习文藻,不讲实学,以致辞章之外,于时势、经济茫无所知。宋儒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诚痛乎其言之也。盖黜华崇实则可,因噎废食则不可。

其“中国文学”一科,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①

从中不难看出,清末中学堂设置的“中国文学”课程中的“文学”是指国粹,而不是注重“文藻”的文人之学,是于时势、经济有用的“经世”之学。精通此学,能作通畅的奏议、公牍,肩负要职重任;能通解古书,传述圣贤精理。“各体”之“体”包括阐理、纪事之体,典礼制诰之体,能存古人乐教之体。

在文体分类史上,文体有过多种不同的标准,如魏曹丕《典论·论文》中的“四科八体”,晋陆机《文赋》“分文类为十”,刘勰《文心雕龙》将文体分为33类,吕祖谦《宋文鉴》分为58类,吴讷《文体明辨》分为127类。《古文辞类纂》撇开形式要素以“为用”为准则划分文体,在文体学上有重要意义,^②而此种文体分类方法恰好和《奏定学堂章程》中的要求相契合,所以它和《经史百家杂钞》一起,成为清末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者进行选文分类的最重要参考。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从“中国文学”一科的教学宗旨来看,其实就是现代“国文”科的先声。^③

① 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212—214页。

② 高黛英:《〈古文辞类纂〉的文体学贡献》,《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③ 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奏定学堂章程》对中学堂“中国文学”科的具体要求为：

入中学堂者年已渐长，文理略已明通，作文自不可缓。凡学为文之次第：一曰文义；文者积字而成，用字必有来历（经史子集及近人文集皆可），下字必求的解，虽本乎古亦不骇乎今。此语似浅实深，自幼学以至名家皆为要事。二曰文法；文法备于古人之文，故求文法者必自讲读始，先使读经史子集中平易雅驯之文；《御选古文渊鉴》最为善本，可量学生之日力择读之（如乡曲无此书，可择较为大雅之本读之），并为讲解其义法。次则近代有关系之文亦可浏览，不必熟读。三曰作文；以清真雅正为主：一忌用僻怪字，二忌用涩口句，三忌发狂妄议论，四忌袭用报馆陈言，五忌以空言敷衍成篇。

次讲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处。其作文之题目，当就各学科所授各项事理及日用必需各项事理出题，务取与各科学贯通发明；既可易于成篇，且能适余实用。^①

从中可以发现，中学堂的国文科教学主要包括读文、作文、古今文章史三大部分：读文，熟读经史子集中的“雅驯”之文，浏览“近代有关系之文”；作文，以“清真雅正”为主；了解古今文章史，同时还要关注“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其中“自幼学以至名家”“先使读经史子集中平易雅驯之文”的规定实际上确定了清末中学国文教科书的选文标准及来源。

第二节 清末时期的现代中学国文教科书

一 中国现代教科书的萌芽与发展

教科书，是特指与国家规定的学制相适应的课本。^②

① 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280页。

② 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变迁》，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8页。

我国古代没有严格分科意义上的教育,学生的用书主要有蒙学读物类,如“三、百、千”、《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科举考试类,如“四书”“五经”《文选》《古文观止》等。研究者一般认为,我国自编的最早的“现代”教科书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朱树人编、南洋公学出版的《蒙学读本》。^①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清末“新政”及新式学堂的建立,中国新式教科书的编辑出版也在不断发展,如:在华传教士章节式的教科书编排设想打破了中国传统教本的模式,其教科书编制的统一制式及精确、科学的插图设计也促进了中国自编教科书的科学化进程^②;1901年,罗振玉通过《教育世界》杂志向国人介绍了日本教科书,“教科书分小学级中学级二者”,“此杂志中所译各学教科书多采自日本,考各种教科书有可通用者……”^③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使中国教科书的编排有了制度依据。加上清政府允许民间机构编辑出版教科书,以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及成立于1902年的文明书局为代表的晚清民间出版机构,都是以编辑出版教科书兴起的,它们编印了大量的教科书,弥补了官方教科书出版的不足。

《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实施后,统一规范了各级学堂的学习年限,与之相吻合的教科书陆续出现。清末时期,尽管政府无力统一教科书的编辑、发行,允许民间自编教科书,但并不是放任自流。《奏定学堂章程》正式确立了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度,它规定所有编译的教科书,无论京师编译局、地方官书局、私家、学堂教员编辑的教材都应经过审查,方准各学堂使用。对民营机构编辑出版教科书的审定尤其注意。《学务纲要》对教科书编排也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其私家编纂学堂课本,呈由学务大臣鉴定,确合教科程度者,学堂暂时亦可采用,准著书人自行刊印售卖,予以版权。”1906年,清政府学部成立了图书局,准备仿文明书局、

① 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② 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3页。

③ 罗振玉:《教育世界·序例》,《教育世界文译篇》,1901年5月第一号。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体例编制一套国定教科书,以便使教科书趋于规范化、统一化。在国定教科书出版之前,学部颁布了初高小暂用教科书书目和中学暂用书目。经审定使用的暂用教科书除文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所出各书外,还有直隶学务处、新学会等单位编的三十多种教科书。由于清政府国定教科书最终没有编辑齐全,而且已经编成的质量饱受批评,到中华民国成立前,全国各学校仍沿用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与南洋公学的教科书,并以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为主。^①

二 清末时期现代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辑出版概况

相对于小学教科书,早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多标以“国学”“国粹”之名。如较早教科书封面明确标示“中学教科书”字样的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新学会社编江起鹏编辑《国学讲义》,该书为奉化龙津学堂普通科讲义,“以世界学理辅成国粹,凡说申说,无取陈言”,书分三编:上编总论国学;中编详述经传;下编列论诸子百家,“由博返约,井井有条,洵保国粹之要”。同年,文明书局还出版了“学堂诸生欲研习国文,莫急于此书”的《桐城吴氏古文读本》,该书的广告中感慨“新学浮兴,标异以为雄”,而“老成好为深识者,懔乎惧亡其所守,以自比于保国粹之说”。随后文明书局出版了廉泉编辑的《国粹教科书》前、后两编。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有正书局出版了王纳善编《国文读本粹化新编》,“专取近今名人著作之论述新学新理者,其文词既足资诵习,焕我国华;其意识又戛戛生新,通乎欧化,故名粹化读本”。这一时期,还有上海时中书局出版的吴筠选编《国文新选读本》,文明书局出版陈东极和许朝贵编《中等国文读本》,茹蕙书室版马仿周评《澡德学堂中学国文课本》,中国图书公司版缪文功和蔡国璜编《中国国文示范》,澄衷学堂编辑《普通国文读本》,苏新书社版李联圭评注《国策编年读本》,上海南洋公学版张美翊选编《南洋公学课文录选》等。

清末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排还处在摸索阶段,有的只编了两三册甚至一册,有的则把科举时期的古文选本进行简要的处理。这一时期和《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五年制中学堂配套,较为完备的中学国文教

^① 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上册)》,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第399页。